

日據時代的台語辭典編纂

前言

閩南語辭書編纂始於 1800 年黃謙編《彙音妙悟》、1818 年謝秀嵐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但自 1837 年麥都思發表《福建方言字典》以後，閩南語研究的主流便歸於基督新教教會。1873 年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可謂登峰造極了。

通觀十九世紀，閩南語研究的重心一直在閩南，尤其是廈門，意即編纂雖為西方人，出版地也多不在閩南，但取材都在閩南。但自十九世紀末期，即台灣割讓日本之後，整個閩南語研究的重心都轉移到台灣。當代新教士所編的閩南語字典，最有名的是 1913 年甘為霖牧師的《廈門音新字典》，1923 年巴克禮的《廈英大辭典補編》都是在台灣的西方牧師在台灣取材所編的。這個趨勢雖與台灣割日無關，却也顯示台灣地位日益重要。

1895 年台灣割日之後，閩南語研究的主流立即歸於以台灣總督府學務部為重心的日本學者。他們編纂了數十本台灣語教科書，創辦了五種台灣語專業雜誌，編了約十本日台辭典或台日辭典，三本俚諺典，數本地名詞典、植物名彙、職業名彙之類的專業詞典，為台灣閩南語留下汗牛充棟的寶貴文獻，是閩南語研究史上最璀璨的時期。

不但如此，在質的方面，一反過去傳教士的業餘研究，以小川尚義為首的日本學者以專業的學養，專業的態度，開創學術研究風氣之先，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其重要地位。只可惜台灣，無論對日本、對中國都是邊疆之地，他們的成就未曾受到應有的重

視。

本文擬從歷史的觀點，略述日據五十年間，日本學者的台語辭典的編纂。

1. 伊澤修二與台灣教育

西方傳教士為傳教的目的所做的閩南語研究成績，雖然頗有可觀，但就規模而言其實遠不及荷屬印尼殖民地政府為統治的目的所編纂的《廈荷大辭典》(1882 年佛蘭根與赫萊斯編)及《荷華文語類參》(1882-1891 施萊格編)。這顯示政治力比民間的宗教勢力有用得多。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為了統治上的方便以及同化政策上的需要，自始即以總督府為重心的官方機構及官員的力量積極進行台語研究，茲將當時的歷史背景略作敘述。

談到日本治台五十年的教育史，不能不提到台灣殖民地教育的創始人伊澤修二。

伊澤修二 1852 (

日本嘉永四年辛亥)

年六月二十九日生於信濃國伊那郡高遠城。幼從外祖父內田文右衛門讀書寫字，稍長入藩黌，以學才拔群，舉為寮長。當時西方勢力直逼東



伊澤修二遺像

亞，先是英、荷、西割據南洋爭奪殖民地，1840 年鴉片戰爭，1857 年英法戰爭，西方帝國主義輕而易舉地打敗東亞老大哥的中華帝國；1854 年貝利打開日本鎖國政策，世界局勢的變遷顯現西方文化的強大。於是伊澤在鑽讀漢文書籍之餘也勤讀翻譯洋書，潛心西

學。

1867年伊澤輾轉江戶、京都之間，開始翻閱英文字典自習英文，旋入蘭學塾習蘭學。

1868年明治維新，伊澤毅然上東京從中濱萬次郎、美國傳教士李爾學英語。1870(明治三)年選為朝廷諸藩貢進生入大學南校。1872年廢大學南校，創為第一番中學，伊澤被擢為幹事，出仕文部省。1875年3月任官立愛知縣師範學校長。1876年7月奉派赴美國考察師範教育，入麻薩諸塞州立橋水師範學校就學，1877年7月畢業。就學中從貝爾氏學「視話法」，後來利用視話法從事聾啞教育、口吃矯正，並著官話韻書《日清字音鑑》。

師範畢業後入哈佛大學學理學約一年。1878(明治十一)年5月回國，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是年10月代校長。1879年3月昇東京師範學校校長，進行大改革，確立日本師範教育基礎。1881年6月任文部省少書記官，1885年4月任文部省大書記官。同年12月昇為新內閣文部省編輯局次長。翌年3月升局長，進行小學校教科書的大改革。同時自1887年1月起兼任東京音樂學校校長，1889年6月起兼任東京盲啞學校校長。二校皆屬草創。^①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思想界發生了由囫圇吞棗的全盤西化到極端的國粹保存主義的論爭。文化論戰反應在教育思想上的是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爭。1890(明治二十三)年2月11日伊澤發起創立「國家教育社」，以期撲滅自由主義的危險思想。5月30日開創立會，伊澤被推選為社長。同年6月創辦「國家教育」雜誌，以宣揚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正當此時，即1890年5月明治頒佈教育敕語，其教育思想和國家教育社所標榜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若合符節，使得該社大為激勵，於是費了四年工夫編成《聖諭大全》，1893年出

版，全書共四千七百頁。

1891年6月伊澤辭職下野專心於國家教育社之事業。1892年創國立教育期成同盟會，大力呼籲國庫負擔普通教育費。1892年6月創立學制研究會，致力於學制之改革。

1895(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底，中日甲午戰爭已經結束，並議定台灣割讓日本，而樺山資紀伯爵內定為台灣總督。伊澤於是趕往在廣島的大本營，以國家教育社代表的身份，晉見樺山伯爵，大談台灣教育抱負。伊澤並出示他自己設計的假名符號注音的一本即將完成的官話韻書《日清字音鑑》^②原稿，他認為此書可以有用於清人教育。樺山當場邀請他擔當開創台灣教育之任。5月8日中日議和，訂立馬關條約，10日樺山資紀任命為總督，21日伊澤修二任命為代總督府學務部長。此後樺山總督即將一切台灣殖民地教育的大任委諸伊澤。

1895年6月17日伊澤抵台北。他當時以為台灣既為清國之地，當然懂得中國的官話，晉見樺山時出示《日清字音鑑》即出於這個誤會。不料台灣人完全不懂得官話，伊澤等帶來一百餘名陸軍官話通譯完全無用武之地。唯一可以通話的是一名英人與台灣人的混血兒吧連德，吧連德曾在香港高等學校畢業，精通英語。^③

伊澤抵台次日即上書設置「土語講習所」，並提出台灣教育意見書。

意見書分「目下急要之教育關係事項」及「永遠的教育事業」二項。

目下急要工作，一是讓新領土人民學習日本話，二是讓移住台灣的日本人學習「土語」。

永遠的教育事業即設立師範學校以培養師資，並設模範小學校、日本語傳習所，漸次普及普通教育。

但是這個計劃從何著手呢？

6月26日伊澤將學務部遷往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惠濟宮內，以六名學務部部員與新聘任的吧連德、林瑞庭二名學務部囑托，開始研究台語、編輯會話書，從事教育。③

當時芝山巖學堂招收的學生名單如下：

甲組：柯秋潔、潘光楮、陳兆鸞、潘光明、潘迺文、潘光楷。

乙組：朱俊英、葉壽松、邱龍國、張經、張柏堂、郭廷獻、吳明德、劉銘臣。

丙組：林隆壽、施錫文、施錫為、柯秋金、柯秋江、吳文明、施錫輝。



傳習生畢業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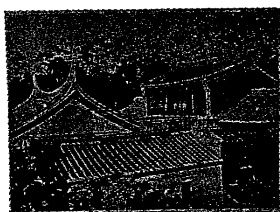
這些日本語傳習生日後成了總督府和台灣人的溝通媒介，譬如柯秋潔、朱俊英、葉壽松、陳兆鸞、張柏

堂成為日後總督府講習員的台灣語講師；施錫文為判任官通譯；吳文明為醫師；邱龍國幫助編成《日台小字典》。

而學務部員則一面教授日本語，一面研究台灣語，編纂教科書，譬如《日本語教授書》、《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等便是他們和傳習生共同編纂的。④

當芝山巖日本語傳習所進行約三個月的日語速成教育時，黑旗軍劉永福一面抗戰一面南退，到了10月17日甲組學生在炮火中結業之時，黑旗軍已退到台南城，10月19日劉永福藏于英船逃回廈門，城內大亂，盜匪橫行，10月23日紳商乃推擁台南府城大學校長英人巴克禮牧師率領十四員向乃木將軍投降。日軍不發一砲入台南城。10月25日伊澤隨樺山總督南下宣諭民衆。伊澤先是訪問文廟，見文廟被日軍改為臨時病院，乃上陳樺山總督，請恢復原狀，派衛兵保護，不得再污辱文廟，以收攬民心。然後(約10月27

日)訪問巴克禮牧師。



芝山岩惠濟宮

時巴克禮已在台灣呆了十二年，創辦了很優秀的學校，有中學、幼稚園、小學校及神學院，住在很棒的宅第、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我為了討教而訪問巴克禮，巴克禮以為我是奸細不肯見，我說：

『決無此事，我完全是為了教育問題討教來的，我聽說先生十二年間從事當地教育，想來聽聽您的意見』。巴克禮乃欣然接見。巴克禮說：『那麼請您說說看怎麼教育。』我說：『台灣既歸我領土，我擬用日本語教育。』他說：『這是錯的。』他的理由是說，當初他們也以英語教育，花了二、三年時間好不容易訓練出宣教師來，不料都走了，搞茶的代理商去了，或者搞通譯去了，可見用英語搞教育有害無益。要以日語教導台灣人民最不可行。『照我的經驗，我以為不可行。一定要用台灣話來教育。你們既然說是要教育人民，那就應該用台灣話，不能用日本話。』我說：『謝謝您的經驗，我有信心可以用日本話。來日再向您請教。』就此分別。⑤

真可以說是歡而散。伊澤在台南只呆了一日半，因領軍登陸台灣的北白川宮病歿，10月28日由安平港護送其遺骸乘吉野號軍艦返日。隨行帶著傳習所畢業生柯秋潔、朱俊英二名赴日觀光。

11月4日抵橫須賀，回東京之後，立即為招募國語學校講習員，即未來的教育師資而奔走。

據伊澤自己的敘述，當時的過程如下：

接著我們訪問了英人巴克禮，當時

不料，12月31日夜，日人所謂「土匪」，實即抗日份子台北的陳秋菊、簡大獅，新竹的胡阿錦等襲擊台北城之後，次日赴芝山巖包圍日語傳習所，殺死六名學務部員，即所謂「六士先生」，是為芝山巖事件。

1896年4月1日廢軍政行民政，台灣教育事業完成了第一階段「目下急要之教育」的日本語傳習所時代，開始實施「永遠的教育事業」，原芝山巖時代教務編纂不分，初級中級不分的時代結束了。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分為教務課，編纂課，初級教育設國語傳習所，中等教育設國語學校。國語學校分師範部與語學部，師範部以培養初等教育師資為目的，語學部分土語科與國語科，以培養吏員或其他公私業務人才。國語科招收台灣人學生，教授日本語；土語科及師範科招收日本人學生，教授台灣語。國語學校的地點設在南門外，即後來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今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

此外相當於高等師範的教育機關為總督府講習員。第一次講習員四十五名是伊澤修二1895年十一月返日募集的師範人才，經過三個月的講習，7月1日結業。同年9月，伊澤又上京去募集，甲種50名、乙種26名，翌年4月1日結業。^⑦

伊澤於明治三十(1897)年7月29日辭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職，同年十月勅選為貴族院議員。總計在職時間不過二年一個月。但他的影響極為深遠，日後的台灣教育幾乎完全按照他的計劃實施。

十年之後的1908年伊澤返台參加台灣鐵路全通式時演講說：

我非常感謝歷任總督及長官，雖然其他事變革急遽，但教育事業只有緩慢變化。

後世教育家、教育史家一致推崇伊澤修二為台灣教育的創制者，實在堪稱為台灣殖

民地教育之父，只差當時沒有這個名稱而已。

2. 殖民地的教育政策

那麼總督府實施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

明治三十六年(1903)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學事諮問會議席上說：

或云現今公學校沒有什麼目的，實則教育方針雖尚在考究之中，公學校設立的目的乃在於普及國語。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又說：

雖然要以普及國語，同化性情相異的民族誠非易事，但像台灣這樣的地方，將來要加以同化，成為我國民，使其永沐恩澤，這是任何人都沒有異議的。……

⑧

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學務課長持地六三郎在台灣教育會通常總會上說：

關於對本島人授與初等教育的目的，第一是同化主義。這是本島統治伊始迄今不變的方針。^⑨

台灣人教育即同化主義即國(日)語教育的殖民地教育方針，從1896年創設的「國語學校」這個名稱就可以窺知一斑。誠如國府種武所說：「從這個名稱的命法就可窺知國語教育在台灣教育的中心位置。」^⑩國府引用小川尙義的談話說：「說本島人教育的目的盡在教授國語，誠非過言」。^⑪

不止主政的官員如是說，實際的法令規章已經明文規定。如國語傳習所規則第一條明白說：

國語傳習所以傳授本島人國語，以為日常生活之資以養成其本國的精神為本旨。

明治三十一(1898)年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公學校規則第一章第一條說：

公學校以對本島人施以德教，授以實學，養成其國民性格，同時令其精通國語爲本旨。^⑫

明治三十七年(1904)公布的公學規則更把國語教育提昇到第一順位：

公學校以對本島人兒童教以國語，施以德育，以養成其國民的性格，並授以生活上必須的普通知識技能爲本旨。^⑬

大正八年(1919)公佈的台灣教育令第五條說：

普通教育以留意身體之發達、施以德育、授以普通技能，涵養其國民性格，普及國語爲目的。

大正十一年(1922)修訂的新教育令主旨亦大致相同。終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普及日語、同化台灣人爲日本國民，使成具健康身體、生產技能、注重道德的順民可以說是殖民地教育的本旨。而其一貫的方針即普及日語教育。

再從課程設計來看。國府種武分析國語學校國語科的課程及授課時數說：

國語學科各總授課時數一週共三十四小時，其中國語科的授課時數共二十一小時。其中狹義的國語，即說話時數十二小時，其餘是讀書作文七小時，習字二小時。^⑭

至於相當於初級教育的國語傳習所日語教育的重要更加明顯。國府說：

甲科全然只教國語。一週教授時數三十四小時之中，第一課程國語十八小時，讀書十六小時；第二課程國語十六小時，讀書作文十八小時。

乙科一週時數二十八小時，國語課佔二十四小時，只加上四小時的算術課。

綜上所述，無論從殖民地官員的自白，法令規章，或課程設計來看，台灣人教育的目的即是同化主義，而教授台灣人聽得懂日

本話、會說日本話是台灣人教育最重要的一環。

3. 對台灣人進行日語教育 教材中的台語對譯

殖民地時期的日語教學法，從教學語言立場可分三個階段發展：

一、對譯法時期(1895-1897)。

二、母語說明的直接教學法時期(1898-1912)。

三、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時期(1913-1945)。

日本佔領台灣並非有備而來，而是甲午一戰，料不到中國不堪一擊，於是順手奪取台灣。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在此之前日本並沒什麼殖民地統治經驗，因此一切都得從頭摸索。在對台灣人做日語教育這方面，自然也是從頭摸索。而其方法很自然採取對譯法。

早在芝山巖國語傳習所時代，學務部即將許多日語教科書譯成台語，其新編教科書亦採對譯法處理，並模倣傳統十五音方式編了幾本教學用韻書。伊澤說：

用台灣土語教授日本語絕對無妨。^⑮

總結初期學務部以對譯法所編的教科書及參考用圖書如下：

1. 日本語教授書
明治二十八年(1895)
2. 小學讀書教授指針
明治二十九年(1896)
3. 小學讀方作文掛圖教授指針
明治二十九年(1896)
4. 新日本言語集甲號
明治二十九年(1896)
5. 台灣適用 會話入門
明治二十九年(1896)
6. 國語教授參考書

- 明治二十九年(1896)
7. 台灣適用 國語讀本初步
明治二十九年(1896)
 8. 台灣適用 作法教科書
明治二十九年(1896)
 9.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
明治二十九年(1896)
 10.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明治二十九年(1896)
 11. 台灣適用 書讀文
明治三十年(1897)
 12. 台灣適用 作法教授書
明治三十年(1897)

這些教科書的編者，以芝山巖事件中殉難的所謂「六士先生」為始的學務部員，及繼之而起的學務部員、國語學校教授、講習會講師等，如前田孟雄、芝山豐平、栗野傳之丞、伊能嘉矩、高木平太郎、新家鶴七郎、石川倉次、柯秋潔、陳兆鸞、朱俊英、葉壽松、張柏堂諸氏。^{①⑥}

這些教科書分二類：語文教材類及台語教育用韻書。台語韻書，即《十五音》著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顯現當時台語之實況，只是為了練習發音及注音法而已。

至於語文教材類也並非要讓學生學習正確的台語而設計，而是以台語對譯為手段，藉使學生明白課文中日語的意義而已。為了牽就這個目的，教材中的台語譯文，以儘量接近日語的說法為原則，而不是以儘量表現道地台語為上，因此這些語料在台語史上的語料價值就不如那些教授日本人的台語教科書了。

初期的日語教學法採用對譯法其實效果不佳。明治三十二年(1899)初國語學校教授橋本武介紹了法人佛蘭梭瓦·古安氏的《語言教學與研究法》(1880)，由學務課出版節譯本《ゴアン氏言語教授方案》(1899.7.6)，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老早從 1898 年即開始實驗此種教學法，效果甚佳。1899 年底學務課又發行《台灣公學校國語教授要旨》(1899.12.18)正式推行古安氏教學法。^{①⑦}

明治三十三(1900)年至三十九年(1906)年總督府共花了七年時間，重編公學校日語教科書，以實踐這個古安氏教學法。這些教科書的書名如下：

台灣教科用書 國民讀本(卷一至卷十二)1900-1903

台灣教科用書 國民讀本掛圖(一至三)1900-1902

台灣教科用書 國民話方教材(卷一至卷六)1900-1903

[改正本] 國民話方教材(卷一至卷六)

台灣教科用書 漢文讀本(卷一至卷六)1905-1906

古安氏教學法的特點是語言與觀念、聽覺的結合，因此揚棄了對譯法的逐字對譯，代之以一句一句的理解與表達。揚棄注重抄寫、習字的視覺訓練，代之以觀念的喚起及聽覺與語言的直接連繫。

這種方法很像直接教學法，但古安氏教學法在觀念的喚起與意義的理解上仍然借重母語。因此這個時期所編纂的教科書，仍在每一課的後面附上台語譯文，謂之「土語讀方」。

大正二(1913)年前田太郎從英譯本轉譯耶斯波遜的《語言教學法》(1901)，題為《エスペルゼン氏語學教授法新論》，介紹語言學家耶斯波遜的直接教學法。

這種直接教學法又稱直觀法，其主旨為以該國語教該國語，不經由母語翻譯。以當時的話來說，就是「用國語(日語)教授國語」。

正如古安氏教學法正式推行之前早經實驗並着手改訂教科書，直接教學法在正式推行之前的明治四十五年(1912)四月即決定了改編國(日)語教科書方針，大正二年新本《公學校用 國語讀本》十二卷及掛圖四幅刊行完畢。在這個新版國(日)語教科書中，把台語譯文，即所謂的「土語讀方」完全刪除。實踐了直接教學法的理想。^⑮

台灣話教育原本是殖民地時代所謂「國語教育」的附帶工作，這種教育並非雙語教育意義下的母語教育，然而台灣人的母語白話文教育，却是意外地在殖民地正式學校的日語教育體制之中以附屬的地位實施，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奇蹟。

殖民地時期對台灣人的台語教育，除了上述日語教科書中的讀本中實踐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每週由五小時逐漸減少到二小時的「漢文」課，即在低中年級以台語音教授中國文言文。但自 1937 年 4 月完全廢除。此後即進入皇民化教育時期。

4. 對日本人進行的台語教學

日據時代對日本人的日語教學，首先是總督府內的「土語講習所」。伊澤修二抵台時發現台灣人所說的閩南話與官話完全不同，他所帶來的百餘位官話譯員完全無用武之地，於是抵台次日即上書樺山總督設置「土語講習所」。以下就日據時代對日本人台語教育之機構簡述如下：

一、「土語講習所」設於總督府內，1895 年 12 月 18 日開課，翌(1896)年 6 月 29 日關閉。其主要對象為陸軍通譯、文武職員，利用公務餘暇，教授台語。台語教師為王星樵、陳文溪，開學當初有 58 名學員，隨著地方廳開設，學員逐漸減少，1896 年 3 月剩下 50 餘名。軍政廢止後(4 月 30 日)併入學務部，6 月 16 日考試，有 12 名學員獲頒修業證書。6 月

29 日閉所。^⑯

二、「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設於明治三十一(1898)年 6 月。分為警察官、司獄官二部，每部分甲、乙二科，甲科修業年限一年，乙科 20 週。又 1923 年起設特科，這個特科只為了教授台語，授課時間半年。茲將 1898-1942 的學生數列表如下：^⑰

	甲 科		乙 科		特 科	
	警察官	司獄官	警察官	司獄官	警察官	司獄官
1898-1906	523	44	5435	1567	—	—
1907-1915	450	22	1273	185	—	—
1916-1924	317	17	1514	99	44	—
1925-1933	272	25	1246	119	248	4
1934-1942	402	28	2140	149	90	1
計	1964	186	11609	2119	382	5

總結以上練習所共畢業學生數 14,255 名。

三、「總督府講習員養成班」這是日本據台之後，伊澤修二為了培養台灣教育師範人才及總督府各部官員的應急速成班，招募對象都是日本已經學有所成或有教學經驗的人才。分甲、乙二種。甲種收日本高等小學校本科正教員以上資格者，乙種收尋常中學校畢業以上資格者。年齡在 26-40 之間。

1895 年 11 月伊澤返日募集第一回講習員，1896 年 4 月 13 日抵芝山巖，同月 15 日開始上課，6 月 30 日結業，授課時間二個半月。畢業生中後來從事於教育者之中以前田孟雄最有名。入總督府學務課任編修書記，參與台語研究的有中堂謙吉。

第二次講習員，是伊澤於 1896 年 9 月上京招募，12 月 15 日 50 名甲種講習員、21 名乙種講習員抵台，次日即開始講習。1897 年 4 月 1 日畢業。授課時間四個半月。本回較有名的講習員為杉房之助，1904 年著有《日台新辭典》一書。

講習員的課程以台灣話為主。其次是各科教學法。

台灣話講師有芝山巖日本語傳習所學生柯秋潔、朱俊英、陳兆鸞、葉壽松、張柏基五名。

教材是他們和六名學務部員所編的《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日本語言集》、《台灣適用會話入門》、《日本語教授書》等台語會話書。

教學法先教八音，然後會話、翻譯等。

經過兩三個月的訓練，講習員大抵習得台灣話的大要，懂得一點簡單翻譯，有些人後來自己練習，可以說得一口和台灣人一樣道地的台灣話。^{②①}

講習會共辦了七次(1896-1900)，其畢業生共 264 名，茲將各屆畢業生數列表於下：

②②

	入學年月日	入 者 學 數	畢業年月日	卒 者 業 數
第一回	1896 年 4 月 15 日	45	1896 年 7 月 1 日	45
第二回	1896 年 12 月 15 日	甲 50 乙 26	1897 年 3 月 1 日	甲 49 乙 22
第三回	1898 年 9 月 22 日	30	1899 年 1 月 14 日	30
第四回	1899 年 3 月 31 日	37	1899 年 7 月 9 日	37
第五回	1899 年 9 月 22 日	29	1900 年 1 月 25 日	25
第六回	1900 年 2 月 20 日	26	1900 年 4 月 19 日	26
第七回	1900 年 11 月 18 日	28	1901 年 3 月 30 日	30

四、「國語學校」1896 年 3 月 31 日軍政結束，改為民政。同時發布台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敕令第 90 號)。同次日創設國語學校，為台灣學事施設的永久事業。初置於芝山巖，後遷台北南門外，即後來台北第一

師範、今師範大學前身。

國語學校初期分師範部及語學部。前者以培養初等教育師資為目的，後者以培養吏員為目的。

語學部分國語科、土語科。前者專收台灣人學生，授以日語，土語科專收日本人學生，專授以台語。

師範部及土語科專收日本人學生，除一般科目教學法之外，主要教授台灣話。

師範部修業年限二年。初期每週授業時數 34 小時，即有 10 小時的台灣話課。其內容，第一年授以音韻性質、言語種類、會話實習、話文讀法、作文等課；第二學年授以會話實習、話文及公文讀法、作文等課^{②③}。但後來隨著日語普及率上升，師範制度幾經改革，至 1919 年台語科減為每週三小時選修課^{②④}。至其授課學生數如下：

國語學校師範部(1899-1901)	29 人
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1902-1909)	93 人
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甲科(1910-1918)	463 人
共計	685 人

國語學校語學部土語科修業年限三年，收 15~25 歲高等小學畢業以上學歷的日本人學生，授以台灣話，以便於在台灣的公私機構就業之須。明治三十年(1897)收容最後一期生，明治三十五年(1902)廢止，所收學生數如下表：^{②⑤}

	入學	畢業	學生數
1897	35	—	
1898	17	—	
1899	19	—	64
1901	13	29	44
1902	—	12	24

明治三十一年(1898)7 月 14 日依府令第五十二號〈土語專科規則〉在國語學校裏附設「土語專修科」。其目的與語學部土語科相同。學生年齡在 16~25 歲之間，經考試及

格後入學。授業課目有土語(白話)、漢文(文言文),修業年限二年。明治三十一年第一期收3名學生,明治三十五(1902)年與土語科一起廢止。其學生數如下²⁶:

	入學	畢業	學生數總
1898	3	—	3
1899	1	—	3
1900	12	3	—

五、私塾 日據初期民間也有幾個專門教授日本人台語的私塾,依筆者所知有二。一是日台語學校、一是台灣語學校。

日台語學校 1896年6月,兼松磯熊在台北市大龍峒創設。這是日本人創設私塾教台語的少數例子,兼松個人又以羅馬字著作了《台灣語發音學》²⁷,以為教本,有伊能嘉矩的題言,據知直到1900年已教授600餘名台語學生。其學生數相當於國語學校師範部(1899-1918)。此校為後來稻江義塾的前身。²⁸

台灣語學校 1906年7月張迺顯創於滬尾街(淡水)。學生數25名,皆為日本人。張迺顯自任校長,亦是該校唯一的教師。

總結以上文獻上可考之公私立學校台語教育下受教日本人結業生數列表如下:

土語講習所	50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	14,255
總督府講習員	264
國語學校	741
日台語學校	600
台灣語學校	25
共計	15,935

至於其他單位如各地法院的台語研究會,及私人的台語班、通信講習會,其學員數尚未詳考。

再比較明治三十八年(1905)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在台日本人總數57,335人之中,能說台灣話的有6269名,約佔10%強的日本人會說台語。而當時台灣人口約三百萬,會

說日語的有11,270名,約佔0.38%。這些會說日本話的台灣人均集中於都市。

十年之後的1915年(大正四年),在台日本人共135,000餘名,會說台語者14,963名,約佔11%。同時台灣人會說日語者54,000餘名,約佔台灣人人口的1.63%。依年齡劃分,以11歲~15歲最多;其次是16歲~20歲。十年間會說台語的日本人增加不多,而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却增加了五倍之多,顯示日語教育的成果,遠大於台語教育。

大約是日本統治時期的正中央期的1920年,依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的結果,台灣總人口365萬餘。其中日本人164,000餘,能說台語者15,760,約佔9.5%。相對的會說日語的台灣人達99,000名,約佔2.55%。並且鄉村比率逐漸升高。

自此以後,能說台語的日本人口不再增高,但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却逐年大幅度增加。依統計,1932年21.7%;1935年29.1%;1938年41.9%;1941年57.0%。²⁹

依上面的數字受過台語教育的日本人共15,935名,會說台語的15,760名,可謂若合符節,可證會說台語的日本人都是受過正式教育的,而不是因為和台灣人生活在一起自然學會的。並且其中又以警察與司獄官訓練出來的執法人員佔絕對多數(14,255名),顯示除非為了統治上不得和台灣人接觸的日本人,幾乎沒有人願意學習台語。

其次,到了1930年代,會說日語的台灣人,即由1915的1.63%,躍升到二十%以上,顯示1913年實施「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收到極為「輝煌」的成果。

5. 台灣總督府的台語研究

5.1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日據時代台語教育的目的,可分二種,一是為了培養日語教育人才;二是為了培養能說台語的統治人才。但國語學

校從 1899-1918 的二十年間才訓練 685 名受教台語課的學生，只佔全部 15,935 名受台語教育者的 4.3%。由此可見教育目的可以說是次要目的，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培養統治人才。而其中尤以直接和台灣人接觸的下級官吏，如警察、司獄官，或法院的通譯等。除此之外甚至有認為研究台語的目的是為了侵略華南。讓我們來看看當時殖民地官員的自白。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文書課長木村匡說：

「然則雄飛東亞之帝國，即未領有台灣，亦當努力研究台灣語，況已領有乎。做為感化之手段、同化之先鋒，不可不研究台灣語，當知研究台灣語是傳授邦語之準備。而台灣語屬南支那語系統，故學之得以利用翱翔於南支那，不可不知。」^③

木村匡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6月25日由文書課長轉任學務課長，此篇是在文書課長任內(1899年12月18日)在《台灣土語叢誌》第壹號的祝詞中的一段。木村匡在學務課長任內極力主張在台灣實施義務教育，充滿了理想主義思想，為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忌，在位不到八個月，翌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免職。其後下野在銀行界服務。在日本統治者中，是一位相當難得的人道主義者，但從上面所引的一段話看來，却也充滿了帝國主義思想。在他心目中，台語研究的目的，既為了同化台灣人，更為了侵略「南支那」。像他這樣的人道主義者都有那樣強烈的帝國主義思想，把他免職的後藤者流更不用說了。

同誌創刊號中另有署名大東學人者說：

……本島久為世人所誤解，而台政常為妄議者所翻弄。博文堂主人(按：指《台灣土語叢誌》發行人湯城義文)深以當台政者不審台灣真相，議台政者不明其實情為憂。為絕此弊根，欲研究彼我

言語，以期事情溝通，乃發刊台灣土語叢誌，亦出於裨補台政之深意，若加上邦語(日語)之研究，使我通土語，使彼習熟邦語，相信裨益不少。……^④

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在《台日大辭典》序上說(1930)：

住民相輯睦，各盡其分，以樂其生，以建帝國一和平之境乃本島統治之理想。而親和融合之道莫先於言語相通。隨伴教育之普及，能解國語(日語)者日月增加，四百萬人中無一人不解國語之日亦不遠矣。雖然，為達此境地，需有相當設施與不斷努力。以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普及獎勵國語自不待言，正確之對譯辭典之編纂，可謂最緊切之一事業。

遍覽日據時代的台語文獻，歸納日本人統治者討論台語研究的目的不外乎：

- 一、普及國語，同化台灣人為日本人。
- 二、了解台灣民情風俗，以利本島統治。
- 三、以本島統治經驗，進軍於華南。

5.2 主要研究者

台語研究的機構，一開始就是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如前所述，伊澤修二原本誤會台灣通行中國官話，1895年6月17日抵台北，才恍然大悟台灣話與官話完全不通。6月26日將學務部移至芝山巖之後立即與學務部員，譯員吧連德及當時所收的學生，如柯秋潔、朱俊英等共同研究台語，翻譯日本國內會話書譯為台語，蒐集台語中的普通用語、商工用語、教育用語等，編為軍語篇、會話書、教科書等。

1896年4月廢軍政、行民政，學務部分為教育、編纂二課。神津仙三郎拜編纂課長及神津曾於明治九年(1876)奉派留學美國阿爾巴尼州立師範學校，畢業後繼續進行師範制度，十一年(1878)四月回日本，任師範學校教授。明治二十九年(1896)4月任學務部

囑託，後升為代編輯課長(事務取扱)，同年12月升任編纂課長。三十年(1897)年八月十八日死於腸加答兒病去逝。

神津在任內即開始進行台語的有計劃研究。學務部1896年11月8日出版的《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同年11月14日所出版的《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都是在他任內完成的。據小川尚義於昭和五年(1930)5月20日的談話^{③③}，這是根據伊澤修二所著的《日清字音鑑》那本假名注音的官話韻書及馬約翰所著《英廈辭典》、《英華口才集》所用的八聲符號所創制的。這段話彷彿說台語最初的假名注音符號是神津仙三郎參考伊澤的官話假名注音符號及教會羅馬字的八聲符號所制訂。

不過據國府種武所記載，在神津未入學務部以前，學務部部員即在芝山巖制作了《日本語教授書》、《新日本語言集甲號》，皆有台語譯文，後者出版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二月十一日，已經有台語假名注音，其所用符號和《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等書所用的綴法及聲調符號完全一致^{③④}，可見假名符號是芝山巖時代的學務部員，即死難的所謂「六士先生」所創，而非神津仙三郎。至於台語假名與伊澤修二《日清字音鑑》有類似之處，正顯示這套假名符號是在伊澤指導之下制訂的^{③⑤}。

不過神津也有功勞，第一，上列十五音字母表二種是在他任內完成出版；第二，他翻譯了馬約翰的《英廈辭典》，準備編輯日台對照辭典，可惜花了一年時間(1896年7月～1897年8月)，只譯了半部便去世了。這項任務從此交給小川尚義。

小川尚義是日本時代對台語研究貢獻最大，成就最偉的一位語言學者。他一生擔當總督府學務部編修工作，凡總督府所有台語研究工作幾乎都是在他手上完成的。

小川尚義出生於日本松山市，1896年日

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畢業。專攻語言學，其指導教授為上田萬年。畢業當年春天，上田萬年告訴他說：「今年七月你就要畢業了，要不要到台灣去看一看？台灣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為了編台灣語、蕃語的字典，招聘一名專攻語言學的青年。」小川尚義本來就想出國看一看，所以當下欣然承諾。

七月畢業，小川回故里，由於年初發生芝山巖事件，兄弟們都替他擔心，但小川已斷然決定渡台。

伊澤九月上京招考第二回講習員，十月召見小川。兩人談起漢語音韻，十分投機，小川告訴他，要把一生奉獻給台灣。

十二月八日，小川隨剛招聘的第二回講習員登上小倉丸，由宇品出航。十五日抵基隆。次日抵艋舺學海書院的學務部，正式在神津編修課長之下當一名囑託。同僚有著名的伊能嘉矩。

翌1897年伊澤辭學務部長職去台，8月18日神津編纂課長去世。翌1898年學務部改為學務課，以後學務課一度屬民政部總務局(1901)，民政部內務局(1909)。明治四十三年(1910)12月27日學務課長持地六三郎休職，小川尚義代學務課長職。翌(1911)年2月17日免職，由隈本繁吉任課長。10月16日改制，學務部下再分學務課、編修課，小川尚義任編修課長。

小川尚義任編修課長五年十個月，大正五年(1916)12月20日免職^{③⑥}，仍任總督府囑託。另外，小川自明治三十二年(1899)起兼國語學校教授，台北帝大創校後應聘為語言學教授，兼任總督府囑託。

小川在任內一直主持《日台小字典》(1898)、《日台大辭典》(1907)、《日台小辭典》(1908)、《台日大辭典》(1931-1932)、《台日小辭典》(1932)、《新訂日台大辭典》(1938上卷)等所有總督府編輯字典的工作。

總督府學務課的編纂工作除了台語字典

之外，更重要的是公學校課本的編纂。日據時代的「國語」教育，在教學理論的研究、實驗方面是以國語學校為中心，但課本的編纂則以學務課為中心。明治三十四(1901)年5月1日敕令第83號明訂台灣總督府圖書編修職員官制，置編修官、編修書記，專編教科書³⁷。小川尙義以編修官的身份，自然是直接參與的人物。另外主要的擔當者是大矢透和杉山文悟³⁸。

日據初期曾有專門研究台灣日語教育的學會，即明治三十一年(1898)九月組成的「國語研究會」，明治三十四年(1901)2月17日改為「台灣教育會」，並創辦「台灣教育」雜誌，1902年10月起每月發行。

小川在會中雖未擔任什麼職位，但「國語研究會」第一次發會(1898年9月18日)在艋舺祖師廟舉行，小川即以「如何對本島人教授國語」為題從語言學上的觀點發表演說，可見他所受的尊崇。

明治三十四年(1901)成立「台灣語學同志會」，小川擔任副會長。

小川在台北帝大任教期間帶領學生對台灣高山族的語言進行詳細的記音，著有《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³⁹，昭和十一(1936)年受學士院恩賜賞。

總之，小川尙義的職位雖然不高，但在整個日據時代的台語(閩南語、山地語)的調查、研究、編纂等所有的工作，他一直都擔任著主導的工作，堪稱日據時代，不，整個台灣史上對台語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

總督府學務課內，除了小川尙義之外。實際參與編纂的助手不少，比較有名的有編修書記中堂謙吉、杉房之助、平澤平七、畠山慎吾，總督府囑託岩崎敬太郎、東方孝義、伊能嘉矩……，另台灣人雇員邱龍圖、潘濟堂、陳清輝、蔡啓華、杜天賜、江心慈、李孝全、楊仁藩等擔任台語顧問。

總督府學務課以外的單位也有許多研究

者，但都是業餘的。茲略舉如下：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 林久三、陳輝龍、東方孝義。

法院通譯 今田祝藏、東方孝義、川合眞永、片崗岩。

警察 熊谷良正。

國語學校教諭 劉克明。

稻江義塾(民間) 兼松磯熊。

6. 日據時代的辭書編纂

日據時代的辭書可分三類，一是韻書；二是辭典；三是語典。所謂「韻書」類指做《十五音》所作的字表，所謂「辭典」指以蒐集辭彙為主的辭書，所謂「語典」指以蒐集成語或諺語為主的辭書。茲分述如下：

6.1 韻書類

日據時代的韻書類，其製作的目的並非為了檢索生字，即所謂「因音識字」或「因音求字」。它們相當於單字表，即列八聲、十五音、字母(韻母)為表，使學者「見表知音」。表中的漢字只是為了提醒讀者「見字知音」，進一步學習假名注音。所以這類韻書雖說是模倣《十五音》，其實是為了教育目的而作，沒有字典的功能，如果把《十五音》比作《廣韻》，這類字表就是《韻鏡》。

這類台灣十五音字母表，在某些方面和傳統《十五音》有相當的類似，如稱聲調為「八聲」並遵循傳統調序，又聲母謂之「十五音」，亦遵循傳統柳、邊、求、去、地……之順序。小川尙義說這類字母表是模倣十五音而作，即是這個意思。但如果從整個韻母結構來看，其實更像《日清字音鑑》。

《日清字音鑑》為伊澤修二唯一的著作、是他本人非常得意的一本中國官話韻書。這本「字音鑑」的編排法，就是按照日本五十音圖的順序以便日人查閱。伊澤在其自傳說：

余之音韻有關初作乃《日清字音鑑》，明治二十八(1895)年六月八日初版，三

十三(1900)年七月第二版。本書以闡明現今日清兩國字音之關係，以便於矢志東亞語學者之攻究爲目的。彙輯之文字爲支那官話普通之四千餘字，按我(日本)國從未慣用之字音，五十音之順序分類，以我普通之字音求彼之字音……。

從來以假名或羅馬字注支那音者少。彼有彼特有之音韻，欲適當注音甚難。今依生理語言學即視話法考究彼我之音韻，附以我之假字(假名)，以若干符號及數箇新造之合字以補其不足。又四聲之別以考其言理，作適宜之符號，新設以我國字表明彼之字音之法……。(39)

由這段話已可推知這本「字音鑑」的特色：一、它是一本韻書；二、它是假名注音；三、它依照假名五十音順序排列。詳細比較《日清字音鑑》和三種《台灣十五音》，立即可以發現兩者的類似：

一、兩者都是字母表。

二、兩者都以假名注音。其假名符號的用法極爲類似。

三、兩者都按五十音順序排列。

爲了明白《台灣十五音》如何以五十音圖順序改革傳統《十五音》的字母順序，茲將兩者韻母對照如下：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君un	堅ian	金im	規ui	嘉e
干an	公ong	乖uai	經eng	觀uan
沽ou	嬌iau	稽ei	恭iong	高o
皆ai	巾in	羌iang	甘am	瓜ua
江ang	兼iam	交au	迦e	檣ue
監aN	鯨u	膠a	居i	乚iu
更eN	禪uiN	茄io	梔iN	薑ioN
驚iaN	官uaN	鋼ng	伽ia	閒aiN
姑ouN	姆m	光uang	門uaiN	糜ueN
噪iauN	箴om	爻auN	扛oN	牛iuN

從上列的五十字母順序完全看不出有什麼排列原則。但《台灣十五音》則明顯地是依照アイウエオ的假名順序排列，並且韻目

用字也多半改爲「英」母(無聲母)字。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ア：鴉a	哀ai	甌au	翁ang	庵am
安an				
イ：伊i	野ia	憂iu	腰io	音im
因in	妖iau	殃iang	淹iam	鶯ieng
烟ien	勇iong			
ウ：汚u	威ui	溫un		
エ：挨e				
オ：烏o[ɔ]	倚oa	苛ou [o]	礮oe	
翁ong	□om	歪oai	□oang	彎oan

<鼻音>

ア°：(哪)aN	(乃)aiN	(腦)auN
イ°：(染)iN	(領)iaN	(丑)iuN
(貓)iauN		
ウ°：(姆)m	(軟)uiN	
エ°：(嬰)eiN[en]		
オ°：(奴)oN	(爛)oaN	(高)oiN

以上四十四字母原爲假名注音，依其原意轉寫爲日台大辭典中所採用的羅馬字，羅馬字與國際音標不符者附注音值於[.]內。由上列字母排列順序可知，完全是依照假名順序排列。也可見得《台灣十五音字母》和《日清字音鑑》的關係。

另外，這類韻書所用的聲調符號則明顯地受到教會羅馬字的影響。茲比較如下：

上平	上聲	上去	上入
to	tō	tò	toh
ト	ト	ト	ト
オ	オ'	オ`	オ'
下平		下去	
tō		tō	tōh
ト		ト	ト
オ<		オ`	オ`

國府種武《台灣教育ノ展開》引用小川尙義的談話說：

此書(指《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附八聲符號》)係據伊澤修二先生的《日清

字音鑑》及Macgowan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英廈辭典)及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英華口才集)所著，八聲符號等與Macgowan同。④

小川尚義在《日台大辭典》〈台灣語之發音〉(P.2)中明白地說：

右新造符號假名及符號(送氣、八音)係前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所製定。

表明了《台灣十五音》及假名注音符號制訂之原委。

另外值得一提的，日據初期民間出現了許多台語會話書，雖然都用假名注音，但方案各人一套，沒有統一。台灣總督府學務課制訂的假名符號就成了統一的標準，學務部所編的字典、教科書，所用拼音符號都遵循《台灣十五音》的規定。民間出版品也都遵循統一標音。《台灣十五音》對於假名標示法也經過改良，同時代的標示法也立刻遵循新法。如《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901)和《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1896)的標示法不同，好比：

	-ng	-n	o	eN
1896	グ	ン	オウ	エイ°
1901	ン	ヌ	オヲ	エエ°

《日臺小字典》(1898)緒言說：

本書……其字音假名及八聲符號悉從學務部所制定之《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法式。

《台日大辭典》(1907)雖未明言遵循什麼方案，但從其標示法可知是遵循 1901 年的《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自從 1901 修訂之後，在所制訂的音韻範圍內沒有出現過不同的假名標音法。

茲按出版先後順序列述台灣總督府所出版的韻書三種於下。

6.1.1 《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

符號》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編

明治二十九(1896)年十一月八日學務部發行。縱一尺一寸一分五厘、橫一尺二寸四分。八頁。洋裝。

緒言二頁，略述台灣閩南語及內容梗概，次述十五音及字母之常音，佔二頁；又次錄常音入聲表及常音之說明，佔二頁；第七頁為鼻音之部及鼻音入聲表，第八頁為鼻音說明及八聲符號表及說明。

其所用字母有：

常音：鴉哀甌翁庵安伊野憂腰音因妖殃淹鶯烟勇汗威溫挨烏倚苛猷翁歪彎□□，31 母。

入聲：鴨沃樞壓快藥乙邑約儲益咽約鬱厄活榷難屋越□□□□，共 24 母。

鼻音：哪乃腦染領月猫姆軟嬰奴爛高，共 13 母。

如依以平賅入的方式計算，則入聲可以不計，常音與鼻音合計 44 字母。

本書書名《訂正……》，則表示在此之前應有《台灣十五音及字母 附入聲符號》之類的韻書發表在先。因在此之前學務部已出版了《新日本語言集甲號》(明治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學務部發行、東京秀英舍印，86 頁洋裝本)，緒言第五說：「此書之撰修係本部員輯取道明」以下六士「及本島人巴連德、柯秋潔、朱俊英等有所與焉。」其所用符號與本表全同④。推想學務部在《訂正……》之前早已編成《台灣十五音字母》之類韻書，唯今已不傳，亦未見著錄。

6.1.2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編。

明治二十九(1896)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行。東京秀英舍印。線裝 38 葉。

緒言云：「此書係以本部曩所編制之《訂正台灣十五音》為本，更施以詳解。」但遍查

全書，只是一種單字表，並無隻字解釋，更遑論「詳解」。未知書名何以如此不實。

此書將入聲併入常音及鼻音之中，不另作表，其常音 31 字母、鼻音 13 字母，共 44 字母，與《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之字母數相同，韻目用字亦同。無英母之用字亦用□表之。

緒言又云：「此書之彙輯，於文字之撰定，柯秋潔、陳兆鸞等參與最力。」二人為芝山巖學堂日本語傳習所最早期學生，此時為總督府講習員台灣話講師。

本書所用符號為《日台小字典》所依據。

6.1.3 《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編

明治三十四(1901)年三月三十一日學務課發行。東京秀英舍印。洋裝 25 開本，緒言 6 頁，內文 101 頁。

緒言云：「此書係訂正增補民政局學務課彙所編制之《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此書對於前書(1896)有幾點訂正增補：

一、前書以漳州音為主，訂正書以廈門音為標準。廈門音無字者，則以泉州音或漳州音充數。

二、所謂「台灣字音假名拼法」亦有所修改，如：

1. 從前以「ン」表-n，今改作「ヌ」。以「グ」表-ng表，今改為「ン」。
2. 從前以オウ表-o(蠟)，今改為オヲ。
3. 從前以エ イ°表-εN(嬰)，今改為エ エ°。
4. 從前以ムンイ表muiN，今改為ムイ。

本書出版之後，總督府及其他所有官方台語文獻的假名標示法都跟著改革。1907 年出版的《台日大辭典》即全面改用新的拼音方式。在標準音方面，本書發表以後，所有的字典都以廈門音為標準。

全書共收五十字母，均按假名順序排

列，即：

ア：雅哀甌安庵紅。

イ：爺妖闍雙伊憂烟英腰容因音。

ウ：威迂溫。

エ：啞

オ：歌歪冤嚙話烏蠟參王。

ア°：籃乃腦口(ām)。

イ°：領猫年娘。

ウ°：每。

エ°：罵。

オ°：麻關筴魔。

ム°：梅。

ン°：秧。

(泉州音)：豬謀灰。

以上五十韻ām韻只收一個gām，注：

「～仔魚」，是個特殊的字。另三個泉州音字母都未注音。豬(ĩ)、灰(-ə)兩韻在《台日大辭典》裏都設計了假名符號(ㄅㄚ)，惟「謀」韻音沒有符號，其泉音歸-io韻。謀韻現在漳州讀-ɔ鹿港讀-io，台北的安溪腔多半讀-ɔ，惟三峽一位讀過「漢學仔」的老人說當讀為[-ou]，和今安溪腔同。

《日台大辭典》(1907)在緒言第三款第二節〈泉州及其類似之方言〉以羅馬字標示「謀」韻字的方音如下：

	泉州	廈門	漳
謀	beo	bo	bo
侯	heo	ho	ho
投	teo	to	to
母	beo	bo	bo
狗	keo	ko	ko
斗	teo	to	to
茂	beo	bo	bo
後	heo	ho	ho

※註：《日台大辭典》的羅馬字系統以-o表-ɔ，以-ou表-o，所以上列-o都應讀為-ɔ。

由上述資料可知：「謀」韻泉州音當讀

-eo。

那麼扣除這四韻，台灣普通腔在 1901 年時已是 46 韻，和現代台灣優勢音的音系差不多。

6.2 辭典類

日據時代日本人編纂的辭典以總督府一貫計劃所編的一系列台語辭典為主，主其事者皆為小川尚義。非總督府系統的只有台灣警察協會所編的《台日新辭書》，主其事者為東方孝義；日本物產合資支店發行的《日臺新辭典》，主其事者為杉房之助。另台灣漢文研究會所編《公學校漢文自習字典》，主其事者為許智貴，為唯一台灣人主編的台語字典。茲按出版先後順序分述於下：

6.2.1 《日臺小字典》

上田萬年、小川尚義主編

明治三十一(1898)年 12 月 13 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發行。16 開本，緒言 2 頁，正文 628 頁、附錄 32 開本 8 頁。共 638 頁。

依緒言所說、本字典共收 2500 個詞條。日語與台語對譯。日語部份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文學士上田萬年主編，台語對譯部份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文學士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員小川尚義主編。上田萬年實即小川尚義的學士論文指導教授，並且也是小川尚義渡台服務於學務部的介紹人。小川尚義渡台的目的就是主編台語字典，他的第一部《日台小字典》由上田萬年選詞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

小川尚義的助手有畠山慎吾、邱龍國、潘濟堂助其完稿；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吉島俊明校正，並經台灣總督府學務顧問伊澤修二取舍裁定。

本書所採用的方音以漳州音為主，假名音標採用的是《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1896)的舊法式。

6.2.2 《日臺新辭典》

杉房之助編

明治三十七(1904)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日本物產合資會社支店發行。25 開本，〈台灣語發音例〉16 頁；音標索引(例)6 頁，正文 616 頁；「國語」索引(例)2+136 頁。台北古亭書屋 1970 年代有翻印。

本書雖名為《日臺新辭典》，但正文以台語詞條附日語注釋，後附日語索引，從體例上看，其實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台日新辭典》。所謂「新」辭典，可能是相對於《日台小字典》而言。

編者杉房之助出生於日本高知縣。1896 年伊澤上京招募「第二回總督府講習員」錄取的甲種學員^{④②}。1896 年 12 月 15 日抵台。畢業後入台灣總督府學務部任編修書記，從事編輯台語辭典，是小川尚義編修官之下的主要助手之一。明治三十六年(1903)奉命休職。明治四十一(1908)死於東京。^{④③}

杉著作甚勤，曾著《日台會話編》(1899)、《日台會話大會》(1902)、《會話參考台灣名詞集附台灣料理法》(1903)，1904 年著本書之後即不再見有著述。

本書前附〈台灣語發音例〉是所有台語字典中，第一本詳細的台語發音說明，由此可以得知當時台北市的發音。假名標音法式已採用《訂正台灣十五音與字母詳解》(1901)的新方案，並採用廈門音為標準。

本書出版在《台日大辭典》(1931)之前，是日據時代第一部台日辭典，和《日台大辭典》可以合為日據時代早期台語的重要文獻。為考究未受日語影響之前的台語不可或缺的史料。

6.2.3 《日臺大辭典》

小川尚義主編

明治四十(1907)年三月三十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發行。〈緒言〉212

頁；〈台灣語之發音〉說明 18 頁；凡例 7 頁；目次 1 頁；正文 1183 頁；〈畫引日臺字音便覽〉66 頁；〈百家姓〉4 頁；〈台灣地名〉10 頁；〈舊台灣度量衡 附貨幣、時間〉4 頁；〈本書編纂之顛末〉4 頁；另前附伊藤博文「意因言通，言因文傳」題字；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序 4 頁；〈台灣語數詞比較表〉2 頁；彩色〈台灣言語公布圖〉1 張；後附〈親族表〉1 大張；正誤表 2 頁。共 1507 頁。

本書是總督府學務課從蒐集資料，逐詞詢問，到全部完稿，前後費時九年八個月（1896 年 3 月至 1905 年 11 月），初時由學務部編纂課長神津仙三郎親自將麥嘉湖的《廈英辭典》譯為日文，1897 年 8 月譯到一半時突因腸加答兒逝去。時小川正編纂《日台小字典》，1898 年春完稿，始接手編《日臺大辭典》，1905 年 11 月全部完稿，1906 年 4 月付印，1907 年 3 月 30 日終於正式出版。

參與本典編纂的，日本人除神津仙三郎氏之外，還有編修囑託加部嚴夫、澤登嘉幸、編修書記中堂謙吉、杉房之助、平澤平七諸氏、台灣人有囑託潘濟堂、雇員白陳發、蔡啓華、莊長命諸氏，幫助選詞、排列、對譯之事。其中以平澤平七出力最多。

卷首所附〈臺灣言語分布圖〉是第一張台灣語言分佈圖，也可以說是最詳細，最近於實況的語言地圖，至今發表的台灣語言地圖，約近十張之多，沒有一張能趕得上本圖的水準。

〈緒言〉212 頁是第一部有閩南語音韻學、方言學的學術著作。分三款，第一款〈南部福建語之特徵〉，探討閩南語音韻上的特徵；第二款〈讀書音與俗音〉，探討文白異讀的關係；第三款〈南部福建語之方言〉，探討閩南語內部方言差。

這篇〈緒言〉顯示小川尚義的語言學成就。通日據時代的台語著作多半是實用性的、語料性的，研究性的、分析性的學術著

作有如鳳毛麟角，這篇長達 212 頁的緒言則全篇是學術性的分析研究，表現日據時代汗牛充棟的台語文獻背後，深厚的語言學基礎。

小川〈緒言〉第一款著作的目的是在顯示閩南語在漢語史上及漢語方言上的地位。他引用了當時可得的羅馬字方言記音，和《韻鏡》的三十六字母、十六轉、四等、開合、四聲一一作比較，比較並一一擬出《韻鏡》音系的中古音，所擬的音和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四冊）極為接近，最大的差別是小川把知系的舌上音擬如梵文的舌尖裏捲舌音。比較的方言材料包括廈門、泉州、漳州、汕頭、福州、客語、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及日本漢音、吳音。南方音的比較材料比高著還多，高氏多出的是十四個官話方言。在比較說明中，如漳泉與廈門不同時亦隨時指出。最後列出各方言與韻鏡音系比較表，計有〈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擬出的中古聲母系統）、〈語頭音（聲母）比較表〉、〈語尾音（韻尾）比較表〉、〈韻音（206 韻）比較表〉。

第二款分析閩南語文白異讀，互作比較，並與福州、汕頭、客語作比較。

第三款敘述閩南語漳州音、泉州音內部方言差。這些敘述印證現代方言資料均無錯誤。小川未說明資料來源，從其內容大體已出現於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873），想是參考杜嘉德的著作，加上一些自己的調查資料。

接著〈臺灣語之發音〉，詳細介紹台灣閩南語的音韻系統及假名標示法。其次介紹音便（音韻變化）及轉調（變調），輕聲。在聲調的描寫方法上比杜嘉德進步許多，他用三調階掌握閩南語聲調，比起後來流行以五調階制描寫的更合理。頗值得今人加以重視。

回想 1907 年當時的漢語語言學，高本

漢、劉復、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人所帶來的現代語言學的科學研究尙未萌芽，日本漢學界及西方傳教士的漢學研究尙停留在傳統漢學或實用漢學的漢語研究階段，我們就知道小川尚義的閩南語研究其實已經走在時代的先鋒，只可惜台灣這個小島，無論對日本而言或對中國而言，都只是偏遠的邊疆，他的研究成果遂未受到很大重視，亦未能開現代漢語語言學的風氣，著實令人扼腕。

正文所收閩南語譯語雖在蒐集資料的初期翻譯了閩南語字典，如麥嘉湖的《英廈辭典》(1883)及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873)，但在對譯的過程中均一一詢問台灣人助手，因此本書的閩南語譯語可視為當時台灣閩南語的實錄，我們若拿來和現代台語比較，立即可以看出近一個世紀台灣閩南語詞彙上的演變軌跡。

後附〈日臺字音便覽〉羅列漢字的日語吳音、漢音、俗音及閩南語廈門、漳州的文白異讀，是閩南語漢字音讀的重要史料。只可惜未能列出泉州音，否則價值當更高。

6.2.4 《日臺小辭典》

小川尚義主編

明治四十一(1908)年3月24日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發行。〈序〉2頁；〈凡例〉5頁；〈百家姓〉9頁；〈台灣地名〉26頁；正文1010頁；正誤表2頁，共1054頁。寬9.5 cm×高17 cm。

這是《日臺大辭典》的袖珍本。小川尚義在序裏說：

余曩承台灣總督府之命編纂《日臺大辭典》，世人病其浩翰，希望更為簡約者，總督府乃令予作此簡約之物，命書肆刻為袖珍本。

由此可知，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之發行本書實出於台灣總督府之命。

6.2.5 《公學校漢文自習辭典》

台灣漢文研究會編

大正十三(1924)年3月10日台北宏文社出版。共249頁。

此書未見，引自吳守禮《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第四節〈台灣方言文獻總志〉P.109。原注云：「台(漳泉)語日語對照。」

6.2.6 《臺日新辭書》

東方孝義編

昭和六(1931)年七月十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內台灣警察協會發行。25開(橫15.5 cm×22.5 cm)，序10頁；〈緒言〉及〈台灣語之發音〉〈凡例〉39頁，正文967頁，日文索引352頁；正誤表13頁。共1381頁。

作者東方孝義，大正二(1913)年渡台任警察，大正七(1918)年轉台灣總督府通譯，大正十二(1923)年任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昭和二(1927)年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曾住過嘉義、臺南、台北、台中。此書為作者在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服務時所完成。他另外著有台語教科書《台灣語の學び方》(1926)、《語學試驗問題並解答集》(1935與鷺巢敦哉合編)、《台灣習俗》(1942)。

依自序〈本書編著に就て〉，作者自渡台任警察職，即有志於蒐集台灣民俗資料，以期深入了解台灣民心，但欲了解台灣民俗，不能不先了解台灣話，於是參考前人辭書如《日台小辭典》、杉房之助的《日臺新辭典》等，將自己所蒐集到的台灣話資料整理成辭書式，作為自己的筆記，這是本書編纂的第一期事業，時間在1918年轉調總督府法院之後。其後因轉任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受練習生慫恿，乃重新起稿修訂，進行第二期事業，爾後受岩崎敬太郎指教，精

益求精，終於昭和五(1930)年三月完稿。

本書完稿之後，作者原擬自費出版，奈因出版費太貴，無力負擔，乃將原稿贈送總督府內的台灣警察協會，經警務課長木原圓氏贊同援助，協會商議結果，同意出版。次年七月正式發行。

由緒文所提供的資料可知，東方孝義與學務課完全無關，他編纂本書可以說是完全獨力完成的。在他之前，獨力編纂字典的有杉房之助，杉曾任學務課編修書記，無疑地接受過小川尙義的指導。東方則一開始便在警察官與司獄官界服務，他在斯界的地位正如小川尙義在學務課的地位相當，只差小川研究台語是專業的，東方研究台語則是業餘的。

東方所完成的這本辭書雖然在規模上遠不及《台日大辭典》，在份量上比《台日小辭典》也只大一點而已，但《台日小辭典》只是《台日大辭典》的節錄，內容完全不超出《大辭典》的範圍，但《台日新辭書》和《台日大辭典》在系統上完全不相干，因此他的假名標音方式、編法、內容都跟《台日大辭典》不盡相同，易言之，大同之中略有小異，茲略舉其差異點如下：

(a)假名標音法不同者多在漳泉特殊方音，至於廈門音大體相同。相異之處有：

台日大辭典	台日新辭書	例字
εN エエ°	エ°	嬰(漳)
ioN イオ°	イヲ°	羊(漳)
iiN ウイ°	ウキ	閑(泉)

奇怪的是他只收了上面兩個漳州音，和一個很罕得聽到的泉州音，至於漳州其他方音、泉州音最具代表性的 i (豬、魚)、ə (袋、火) 之類音，只在〈緒言〉中用羅馬字標音介紹，並沒有為它們設計符號，也不收入字典中，這就不免令人感到體例不一了。

(b)《台日大辭典》是按實際聲母編排，如ハ行排完了再排バ行、パ行；《台日新辭

書》則ハ行、バ行、パ行混在一起，完全按照假名五十音圖排列。其他濁音也是一樣。

(c)《台日新辭書》和《台日大辭典》幾乎同時出版，但編纂時互不參考，因此內容上完全不重疊，所舉的例句完全不同；《大辭典》收辭遠多於《新辭書》，但個別辭的注釋，《新辭書》往往較詳細；最重要的是，《台日大辭典》因為是以翻譯麥嘉湖《英廈辭典》、杜嘉德《廈英大辭典》為基本材料，故其內容可能摻入一些台灣不普遍的說法，但《新辭書》完全是作者對台灣話的蒐錄、聽到什麼就記下什麼，因此他所蒐集到的應當較可相信是當時台灣的口語，譬如：tsue⁷ tsue⁷【儕儕(多多)】之類同義疊音詞，在台灣除了教會人士之外，幾乎沒聽過，《新辭書》未收，《台日典》却收入了。

《大辭典》蒐集的範圍只限於台北地區、南部音或南部詞彙便多所漏略。東方孝義曾住過嘉義、台南、台中、台北，因此《新辭書》收入許多南部方言詞。如蕃茄(トマト)，南部說【柑仔蜜kam¹a²bit⁸】，《新辭書》收了這個詞，注：トマト，《大辭典》也收了這個詞，却注為阿仙藥或ガンビール(染料或摻入檳榔內用以咀嚼的收斂劑或清涼劑原料)。北部蕃茄多半說【臭柿仔tshau³khi⁷a²】，《大辭典》收了這個辭，注：トマト。而《新辭書》却不收。

由此可見，《台日新辭書》雖亦以廈門音為標準音，但在詞彙上則完全是台灣的，並以南部方言詞彙為主。

由這些觀點來看《台日新辭書》，可以說是總督府學務課系統以外的台語研究界最優秀的異軍。它是日據時代所編的辭典中唯一能夠大大補充《台日大辭典》的小辭典。我們應該給予高評價。

本書正文 1320 頁，其中 966 頁是《台日辭典》本文，969 頁以後是〈附錄 國(日)語引臺灣語〉。在這一點上頗類杉房之助的《日

台新辭典》。

6.2.7 《臺日大辭典》

小川尚義主編

上册昭和六(1931)年三月十日；下册昭和七(1932)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16開本，序1頁；凡例2頁；〈台灣語之發音〉10頁；索引表2頁；正文上册876頁，下册1043頁，共1916頁。1970年代古亭書屋翻印。

本書是台灣總督府總務局學務課所編的第一部台日辭典。在此之前，所編的都是日台辭典，只有民間才編台日辭典。總督府總務局長人見次郎在昭和五(1930)年九月的序上說：「相對於日台對譯(辭典)，需要台日對譯(辭典)，恰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於是日臺大辭典刊行之後，立即著手編纂台日大辭典。經二十餘年來之調查研鑽(按自1907年發行《日台大辭典》至今1930年已23年)，終告完成，公刊於茲。」

編輯經過，依凡例說：

本書之編修，以元總督府編修官、現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總督府囑託小川尚義為主任。其第一事業材料蒐集及譯語由元編修書記平澤平七擔當之，雇員潘濟堂、蔡啓華、陳清輝輔助之。第二期事業材料追加、譯語精選及語原調查由囑託岩崎敬太郎擔當之，雇員陳清輝、杜天賜、江心慈、黃銘銓輔助之。

另外，在專門用語方面也有專家參與。凡例又說：

譯語之中，關於動物、礦物委託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堀川安市、植物方面委託新竹州地方技師島田彌市、藥物疾病方面委託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杜聰明(按即高雄醫學院創辦人)調查、採錄。

由此可見，《台日大辭典》和《日台大辭典》是台灣總督府運用政府財力、人力、動

員所有能動員的人才所編纂而成的兩部台語大辭典雙璧。

全書共1916頁，共收九萬餘台語詞，日語對譯相當準確。

發音以廈門音為標準，凡例說：「這是因為廈門音介於漳州音、泉州音之間，兼有兩者特質。」但這不應當成為標準音的依據，台灣稍微偏漳的優勢腔也同樣是介於二腔之間，何以從未受到重視，這是因為這個漳泉混合的優勢腔在當時尚未成形，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廈門可能因為通商口岸造成的商業中心地位，連帶地使廈門腔成為漳泉人公認的代表方言，因此西方傳教士、日本統治者都紛紛改採廈門腔為標準。

雖然如此，本書仍儘量採錄漳、泉各地方言，以及新生的台灣話。依凡例所舉，有泉州、安溪、同安、長泰、灌口、漳州、漳浦等方言，另收入來自日語的及新創的新詞。

關於語詞的詞色(情感色彩)或語用場合也有注明。

比如文言詞彙，只用於某個階層，不用於口語的，注為(文)表示「文語」；開玩笑的話注為(戲)，表示「戲言」；下流粗野的話注為(卑)，表示「卑語」；罵人的話注明(罵)，表示「罵語」。

《台日大辭典》是除《荷華文語類參》(1884)之外，最大最詳細的一部閩南語辭典。它的價值可以略舉如下：

(a)它豐富地蒐集了台灣閩南語的口語詞彙，也適量蒐集了一些文言詞彙。是有史以來最詳備的口語辭典。其漏收的詞彙大部份是罕用詞、專業詞，或南部方言詞。

(b)它雖以廈門音為標準音，但漳、泉各地方音也儘量蒐羅，尤其是泉州音蒐集得相當多。其所蒐集的漳、泉音不是指閩南的漳州音、泉州音，而是台灣保存的漳、泉音。大辭典中所記載的方音，大多至今尚可在方

言中聽到的，至於已在台灣消失的方音，在本書中便不收錄。比如：

1. 漳州-ε≠e，假開二的字都讀-ε，《日台大辭典》(1907)在緒言中〈漳州語及其類似方言〉章中提到過，但在同書〈日台字音便覽〉中却都記爲e，可見當時-ε音已成罕用音。但到《台日大辭典》編纂時代，不但不收入辭典中，連在〈台灣語之發音〉章中說明一下都沒有，顯示在當時-ε音已消失了。

2. 《訂正臺灣十五音字母詳解》(1901)紀錄了一些泉州方音，如「謀」韻(鈎、斗、母、后)，和「腰」(-io)、「烏」(-ɔ)都不同音，依《日台大辭典》〈泉州語及其類似方言〉一節的紀錄，泉州音讀-eo，在《台日大辭典》中全部記爲-io；又《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收了泉州(梅)韻字(參sm：人參)，現代鹿港腔也唸sm，北部泉州腔多讀sim，《台日大辭典》不收sm這個泉州音，只收sim與som二音。

由此可見，《台日大辭典》所紀錄的是編纂當時台灣北部閩南語的實際語言。儘管台灣語音在變化，小川眼睜睜地看著變化，但是小川仍然嚴守著描寫語言學的原則，把那已成死音的語音排除在辭典之外。

總之，面對這樣一本內容包羅萬象，厚達1916頁，純粹活語言紀錄的台語辭典，我們不禁對編者的學識、精神、毅力，寄予無限的敬佩。

6.2.8 《台日小辭典》

台灣總督府編

昭和七(1932)年十一月二十日台灣總督府發行。32開本，凡例8頁，索引表6頁，正文1238頁，正誤表3頁。共計1255頁。

正如《日臺大辭典》出版後，立即於次年出版《日臺小辭典》，台灣總督府於1931年出版《臺日大辭典》之後，翌1932年底即

出版了這本《台日小辭典》。

本書沒有緒言，沒有編者的話，但它的內容並未超出《台日大辭典》。依凡例說，這本小辭典「收錄了二萬餘詞」，都是從《台日大辭典》中摘錄常用詞彙所編成的，因此可以想像其編纂者也應該是《台日大辭典》的原班人馬。

6.2.9 《新訂日台大辭典》(上卷)

小川尚義主編

昭和十三(1938)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16開本，伊藤博文「意因言通言因文傳」橫額一張，後藤新平《日台大辭典》原序2頁；《新訂日台大辭典序》2頁；凡例10頁；正文1132頁，共計1146頁(橫額不計)。

本書是台灣總督府《日台大辭典》(1907)的改訂本。新序說：「本書始刊於明治四十(1907)年三月，是有關台灣語唯一之學術性辭書，其價值世所公認，又以其實用大行於世。然今已絕版，府內無存書，而世之求書者不絕，要求再版。但出版以來已經三十年，時勢卓然進步，由今觀之，書中收錄四萬二千餘詞，顯然甚感不足，抑且對譯必需修正之處不少，不能不改訂、增補、再版。」

於是由昭和八(1933)年四月起，即《台日小辭典》出版後不到半年，便開始著手編纂《新訂日台大辭典》。直到上卷出版的1938年，歷經五年工夫，採收日語辭十萬六千餘條，施以適正之對譯，先整理ア至シ五萬五百餘條，編爲上卷出版。

1938年正是中日大戰方酣之時，皇民化運動已實施了一年，也許爲了時勢所迫，《新訂日台大辭典》下卷一直未能出版，1945年日本戰敗，下卷原稿亦不知去向。

參與改訂的，仍以「元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現台灣總督府囑託小川尚義爲首班」，助理有《台日新辭書》(1931)作者東方孝義，當時已從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轉台灣總督

府法院通譯兼台灣總督府囑託，元總督府雇員現任台灣總督府囑託黃銘銓、宮川重三郎，雇員李孝全、楊仁藩、故台灣總督府屬岩崎敬太郎。

以上八部閩南語辭典是日據時代閩南語辭典的全部。因為東方孝義後來入總督府任囑託，參與編纂《新訂日台大辭典》，所以儘管早期編纂《台日新辭書》是獨力完成，但到頭來還是跟總督府學務課發生關係，這一來就變成，日據時代所有台語辭典的日人編者都是總督府學務課官員了。

總督府非常重視閩南語的研究，對客家話的研究雖也有做了一些，却相對地少得太多。在客語辭典方面，筆者所見的只有一部。

6.2.10 《廣東語辭典》

台灣總督府編

昭和七(1932)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

橫9 cm×縱17 cm袖珍本。凡例5頁，目次1頁，正文1554頁；正誤表2頁，共1562頁。1986年1月台北南天書局影印。

這是一本袖珍型的日客對譯辭典。所收日語詞二萬五千條，施以簡單的客語對譯，有例句的不多，大約只佔十五分之一，其餘都只有單詞譯語。

客語對譯詞逐字注音，語音採四縣的鎮平縣方音為標準。所用假名符號模倣閩南語標示法稍加改良。閩南語的聲調符號被當成一種調值符號加以沿用。

凡例中沒有提到編纂經過，也沒有提起編者姓名，因此在沒有進一步史料之前，無法知道。

日據時代還有兩本可以歸入辭典類的特殊名詞典，即：

6.2.11 《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職業名字彙》

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

大正十一(1922)年十月二十三日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發行。16開本，凡例4頁，〈第一編分類引〉237頁；〈第二編イロハ引〉204頁；〈第三編字劃引〉300頁。共745頁。

這是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依第一次台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的結果，所彙編的職業名詞典。每一種職業都附上日語台語的對照，然後加以分類：大分類(款)、中分類(項)、小分類(目)，編為第一編；其次按日本假名編成索引，是為第二編，按漢字筆劃編成索引，是為第三編。各編均附日台名對照，可以自成單元。是大正十一(1922)年當時台灣職業名總彙。依當時分類，共10款、41項、260目，比傳統所謂360行少100行。但每一目底下還有細目，總計所有職業名9,942個，比起大正四年所作的「第二回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結果的7,558個還多2384個，顯示時代在進步，職業名稱也在繁增。比起傳統360行就多太多了。

本書台語對譯由台灣總督府囑託平澤平七擔當。平澤平七是小川尙義編《日台大辭典》最得力的助手。

6.2.12 《臺灣植物名彙》

佐佐木舜一編

昭和八(1928)年十月三十一日台灣博物學會發行。有兩種版本，一為25開本，一為32開本。目次1頁；序及凡例、參考書目26頁，〈台灣植物自然分科綱目一覽表〉8頁；正文、〈學名索引〉、〈和名索引〉、〈台灣方言索引〉、〈漢字索引〉562頁，全書共600頁。

著作佐佐木舜一是台灣博物學會幹事、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調查係係長。編成本書前親身參與台灣島植物研究調查二十年，對台灣所產植物有非常深入的見解，因鑑於學界之需要，乃繼川上瀧彌《台灣植

物目錄》(1900)、早川博士(Hayata, B.) "General Index to the Flora of Formosa" (1916)之後,參考學界新發現的事實,著為本書。

本書之所以能夠分類為台語辭典,是因為作者不止關心植物學上的學名,日文名,並特別關心土名,即台灣各種土著民族的原名,包括閩南語、客語、山地各族語。山地各族名稱均標示族名,閩南語名稱往往有一物多名,均儘量列出,著作態度相當嚴謹。當然由於調查層面不夠廣,漏略之處難免,比如蔣草、煮飯花、播田花……,許多筆者所知的植物名在這本名彙都找不到。

關於閩南語名稱,不但用了漢字,並用羅馬字逐字注音正確的說,應該是用教會羅馬字記音,注上漢字。日據時代的台語文獻幾乎一律用假名注音,佐佐木這本名彙一反過去,全部採用羅馬字,即連日語也用羅馬字拼音。這大概是為了和西文並列方便起見。

佐佐木在凡例上說:

和名之後插入本島語即福建語及廣東語。本島人所使用的植物名稱,凡出現於可信賴的本島植物相關文獻者悉數收錄,其發音並據甘為霖《廈門音新字典》及張洪南氏編《臺灣羅馬白話字自修書》,托同事謝阿才氏一一注音,以便通覽。又廣東語(客語)因未全部調查,無法全部收錄,僅據數種名著請同事黃紹霖氏注上發音,以便查閱。前者用羅馬字體,後者用意大利字體。發音之後插入漢字。漢字便於為文,羅馬字表發音即語言,以便於記憶、紀錄。

6.3 語典類

語典指蒐集成句語料的辭書,日據時代的語典,依筆者所知都是諺語典。茲列述於下:

6.3.1 《日臺俚諺詳解》

片崗巖著

大正二(1913)年九月十日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內臺灣語研究會發行。序10頁;例言3頁;索引6頁;正文276頁;共計295頁。

本書作者是台南地方法院通譯,依序上說,片崗巖利用餘暇,蒐集台灣民間流行的故事、譬喻、俚諺、隱語,十餘年間得二千餘句,譯為日語,後附日本俚諺,編為《日臺俚諺詳解》。因此本書分為三部門:即〈日臺對譯門〉、〈臺日對譯門〉;〈母國俚諺門〉。前附台灣總督府法院判官台南地方法院長藤井乾助題字;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朽木義春序;台灣總督府法院通譯澤谷太郎題刻,片崗巖自序及例言,索引,由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內臺灣語研究會發行。

大正十(1921)年二月十日片崗巖又著《台灣風俗誌》(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1184頁),本書部份內容收入該書第八集,〈日臺對譯門〉收入其第一章(529頁-610頁)〈臺日對譯門〉收入第二章(691頁-722頁),內容完全相同。

本書著作態度不甚嚴謹,注音錯誤甚多,又不注聲調。解釋也不太正確。即連所收的俚諺都有許多錯誤。

6.3.2 《臺灣俚諺集覽》

平澤平七主編

大正三(1914)年五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發行。

25開本。序2頁;凡例及目次6頁、正文620頁;索引213頁;正誤表5頁,共846頁。

這是總督府所出唯一的一本俚諺典。依凡例所云,「本書收泉、漳俚諺四千三百餘條」,施以日文解釋。書中將台灣俚諺分為天文地理、神佛、命運、國家、人倫、道德、人、身體、衣食住及器用、職業、學事、言

語、禽類、獸類、蟲類、魚介類、草、金石、事物、雜，共十六類，分別輯為十六篇。每句台諺均於漢字旁逐字注音，書末又按注音假名五十音圖順序編為索引。

依凡例所云：「本書的編纂以編修書記平澤平七呈其事，本島人蔡啓華、潘濟堂、陳清輝輔助之，編修官小川尚義校閱之。」差不多是《日臺大辭典》和《台日大辭典》的原班人馬，亦即是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那一批專事編修台語辭典的編修官（書記）及雇員。差別的是，小川尚義所有台語辭典都擔任主編，這一本只擔任校閱，却由平澤平七擔任主編。

比起片崗巖的《日臺俚諺詳解》，本書在量上增加一倍，在質上也好上一倍，無論是注音的準確、解釋的恰當，或編輯態度的嚴謹，都不是片崗巖的著作可以比擬的。

6.3.3 《日臺俚諺 日日の修養》

熊谷良正編

昭和十一（1936）年八月二十日編者發行。

劉克明序1頁；編者自序1頁；例言2頁；目次2頁；正文330頁；〈俚諺索引〉（日文部份）32頁；〈臺灣俚諺索引〉34頁；共計402頁。

編者熊谷良正編著本書之前原為台北州巡查部長，在警察界服務二十餘年深研台語，編成本書。他另著有《臺灣語之研究》（共1,099頁，1931年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是一本大部頭的台語教科書，內容偏重於警務用語。

這本俚諺集蒐集了日語及臺語相近的俚諺，分為三百六十五類編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中。每日選擇一個主題，介紹日語及台語相關俚諺，加以解釋，兼介紹相關歌謠、詩、歲時、節慶、習俗等。編法活潑，足以引發互學日語、台語俚諺之興趣。

書前有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原國語學校）

囑託劉克明先生序、戰前日人著作請台灣人校閱，並作序者極少見。

以上是正式出版的俚諺集、筆者所見僅止於此。另未出版者，今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藏有一部：

6.3.4 《臺灣俚諺集》

公學師範部乙科/國語部第三學年生共著
明治四十三（1910）年八月編。手稿。上冊269葉；下冊304葉，共573葉。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藏。

本集子是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國語部學生的作品，每一篇都題為〈本島二行ハルル俚諺及ビ其ノ詳解〉，想是學校規定的作業，學校蒐集之後裝訂成冊，題為《台灣俚諺集》，雖說是「第三學年生」的作品，但也有注明是「第五學級」的。每一名學生蒐集的台灣俚諺多寡不一，少則數十條、多則數百條，都是普通的諺語，也有少數格言，重覆者頗多，總共幾條，未曾統計。每條諺語先以漢字寫下台灣俚諺、然後附以日文解釋。是了解當時普通諺語最好的材料。又作品皆以毛筆寫在16開本大小，兩頁合為一葉的舊式十一行或十行紙上。只有一名用鋼筆書寫。足見當時仍以毛筆較流行。

又所謂公學師範科、國語部是當時國語學校的科系名。^{④5}

註解

1. 參照佐藤源治《台灣教育の進展》P.31-32。
2. 《日清字音鑑》初版刊於1895年6月，1899年7月再版。全書以韻書型式編輯以假名注官話音，收官話常用字四千餘，又按日本假名五十音順序排列索引官話音。此書由今觀之雖甚平凡，但在當時，是以假名注官話音之創舉。中國注音符號遲了將近二十年（1913），才由教育部採用。
3. 參見《台灣教育沿革誌》P.10。
4. 參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25。

5.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十月伊澤返台列席台灣鐵道全通典禮時，在台灣教育會以〈台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為題，所做的演說。原載明治四十一年《台灣教育會雜誌》第 80-81 號，收入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41-56。
6. 第一回講習員加藤元右衛門時任太平公學校校長著〈芝山巖懷舊錄〉，收入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76-87。
7. 1908 年 10 月伊澤演說〈台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同 5 註P.52。
8. 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125。
9. 同上P.143。
10. 見國府種武《台灣における國語教授の變遷》P.79。
11. 同上P.82。
12. 同上P.89。
13. 同上P.90。
14. 同上P.80-81。
15. 1896 年 7 月 1 日第一回講習員結業典禮時，伊澤部長報告演說。收入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70。
16. 見加藤春城《台灣公學校に於ける國語教授法小史》載大正二年臺灣教育第 139~142 號。收入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309。
17. 參見國府種武《台灣に於ける國語教授の展開》P.324-340；蔡茂豐《中國人に對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P.164-199。
18. 參見蔡茂豐前著P.257-259。
日據時代的日語教學法，若細分，在古安氏教學法的末期又有所謂內容中心主義、練習主義，又大正十年(1921)四月公學校《讀法、說話教授細目》中實踐了所謂構成式教學法、昭和十三年(1938)七月安田氏編《國語講習所用國語教授法》所採用的所謂巴馬氏教授法，都只是大潮流中的小浪花，並且跟教學語言無關，因此日據時代的日語教授，大略只能分為三期：即對譯法、母語說明的直接教學法，以日語教日語的直接教學法。
19. 見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P.164-165。
20. 引自村上嘉英《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P.78，原注云：「本表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946 年台北P.1324)表 517〈歷年警察官與司獄官練習所教員與練習生〉及《台灣治績志》314 頁。」
21. 同 7 註。
22. 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75。
23. 參見台灣省文獻會編《台灣省通志稿卷五，教育志教育設施編》P.231，1956 年。轉引自村上嘉英(1966)。
24. 同上P.242。
25. 引自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213。
26. 同上。
27. 1899 年初版，1900 年二版，台北發行。序言、自序、緒言共 26 頁、本文 36 頁。
28. 參見村上嘉英(1966)P.81。
29. 據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233。
30. 以上數字轉引自村上嘉英(1966)P.85-87。原注云：「台灣首先於 1905 年實施第一回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十年後再實施一次，1915 年實施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五年後的 1920 年才舉行第一次台灣國勢調查。以後每十年舉行一次國勢調查，其間每五年舉行一次簡易國勢調查。」
31. 《台灣土語雜誌》第 1 號祝詞。明治三十二(1899)年十二月十八日發行。
32. 同上，P.2。
33. 見國府種武《台灣に於ける國語教授ノ展開》P.93。又見國府種武《台灣に於ける國語教授の變遷》P.115。
34. 見國府種武《台灣に於ける國語教授の展開》P.69-71。
35. 吳守禮《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P.12 亦主張「日本始政不久已着手制訂字母表及八聲符號。」
36. 以上學務課的資料參見《台灣教育沿革誌》P.142-147。
37. 參見蔡茂豐《中國人に對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P.252。
38.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236。
39. 見伊澤修二《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P.316-317。又國府種武《國語教育ノ展開》P.18-30 有伊澤《日清字音鑑》的內容及標音法的概要介紹，可以和台灣十五音作對照。

40. 國府種武《台灣教育ノ展開》P.91-92,引用小川尙義昭和五年(1930)5月20日談話。
41. 原書未見,參照國府種武《國語教育の變遷》(二),P.91-92。
42. 見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73。
43. 同上P.243。
44.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53-54。
45. 國語學校一開始即分師範部、語學部,語學部分國語科、土語科。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七日修改國語學校規則,師範部分為小學師範部,公學師範部。前者以培養小學校(日人小學校)師資為目的;後者以培養公學校(台人小學校)師資為目的。參照佐藤源治《臺灣教育的進展》P.93。

參考書目

除第六節所列的辭典之外,其他參考文獻有:

伊澤修二

〈第一回講習員結業典禮報告及演說〉 明治二十九(1896)年7月1日演說,收入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68-72。

〈台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 明治四十一(1908)年十月伊澤返台參加台灣鐵道全通典禮時在台灣教育會通常會演說。載1908年台灣教育會雜誌第80-81號。收入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P.41-56。

加藤春城

〈台灣公學校に於ける國語教授法小史〉 大正二(1913)年台灣教育雜誌第39~142號,收入吉野秀公(1927)P.291-312。

〈公學校に於ける國語問題〉 大正七(1918)年台灣教育第188-189號,收入吉野秀公(1927)P.275-291。

吉野秀公

《台灣教育史》 昭和二(1927)年著者台北發行。正文580頁。

國府種武

〈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教授の變遷〉 載昭和五(1930)年《言語と文學》雜誌第三輯:51-94;第四輯:83-119。

《臺灣に於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 昭和六(1931)年台北第一教育社發行。

《臺灣に於ける日本語教の過去と現在》 昭和十一(1936)年台北,台灣子供世界社發行。

《日本語教育の實際》 昭和十四(1939)年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發行。正文542頁。

佐藤源治

《臺灣教育の進展》 昭和十八(1943)年台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發行。正文276頁,年表42頁。

台灣教育會編

《台灣教育沿革誌》 昭和十四(1939)年台北,編者發行。正文1098頁,年表71頁。

吳守禮

《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 民國四十四(1955)年著者油印發行。大立出版社翻印。

《臺灣省通誌人民志語言篇》 民國五十九(1970)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

村上嘉英

《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 昭和四十一(1966)年日本文化雜誌第45號:62-108。

蔡茂豐

《中國人に對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 1977年日本東京教育大學(筑波大學前身)博士論文。

張良澤

《台灣語とは?—台灣語著作書誌を兼權ねて—》 1884年筑波大學外國語センタ——《外國語教育論集》6:141-182。

渡邊雪羽

《日本植民地時代に於ける台灣の漢語教育》 1989年《台語文摘》第五號:4。